

什么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农村金融排斥难题

——基于2010年中部六省667县(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谭燕芝 陈彬 田龙鹏 黄向阳*

摘要: 本文基于2010年中部六省667县(区)的经济数据,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什么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农村金融排斥难题。文章发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机构多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证实,县域经济水平差距大约解释了农村金融排斥差距的33%。这一结论对商业类金融机构和农村类金融机构在县(区)的布局设点同样适用。城镇化因素在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如果各县(区)城镇化水平均等,那么农村金融排斥的差距大约会缩小20%。建设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以及设法实现农民收入更快增长,也是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难题的关键。在未来打政策组合拳时,既要有轻重缓急,又要做到因地制宜。

关键词: 农村金融排斥 城镇化 回归方程分解分析

一、引言

农村金融排斥问题形成的根源,在于发展中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引导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King and Levine, 1993)。在二元体制背景下,农村和农业通过多种途径扮演着为城市和工业廉价输送资金、原材料等要素的角色,其中,资金的输送主要是通过国家自上而下设立的国有专业银行分支机构来完成(汪小亚, 2009)。自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国有银行要加快商业化改革步伐后,利润最大化动机驱使下的国有银行加速离乡,“系统性负投资”状况持续恶化,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波动中逐步扩大,从1984年的1.8上升到2002年的3.2。2003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重新成为重点,特别是本轮世界金融危机中,农村经济稳定程度总体好于城市,农村和县域在“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得

*谭燕芝、陈彬、田龙鹏,湘潭大学商学院金融系,邮政编码:411105,电子邮箱:tan_yanzhi@126.com;黄向阳,湖南银监局,邮政编码:410005。

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金融排斥背景下信用环境与中国农村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湖南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项目批准号:71273220)、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政府行为、信用环境与银行绩效:基于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农户信用放款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79012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金融为湖南小微企业发展服务的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B03)、湖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农村信用环境创造研究——基于浏阳2000农户信用行为的实证分析”(项目批准号:11K0641)的赞助。感谢高连水的耐心指导与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益于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势头得到遏制。相应的,农村金融改革发展问题也由冷转热,由摸着石头过河转为理性推进,重新成为政府施策、学界关注的热点。

本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进行写作的。在农村经济金融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时,试图对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难题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以期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农村金融排斥问题进行文献述评;其次,从理论层面探寻农村金融排斥问题形成的根源和破解之道;再次,基于2010年中部县(区)数据,从实证角度对前文理论分析进行检验,并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方法,定量测度各影响因素对农村金融排斥的贡献度有多大;最后,本文按轻重缓急提出应对策略。

二、文献综述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最早是从社会排斥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概念(周立,2010),主要是从供给层面研究特殊地区和特殊群体面临的金融服务短缺问题。Rossiter(1997)认为,判定是否存在金融排斥,最浅显的方式是考察该地区是否存在金融机构等。Kempson和Whyley(1999)认为金融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复合概念,包括六个维度:地理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营销排斥、评估排斥和自我排斥。但是澳新银行(ANZ)认为六个维度之间存在高度的重叠性,且遗落金融知识等要素的影响。Demirgüç-Kunt和Maksimovic(1999)则在ANZ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金融排斥分为金融供给方的被动排斥和金融需求方的主动排斥。可见,对金融排斥问题的表征并不统一。以金融机构存在与否的单维度表征观点,被批评不够全面,但却简单易行;以动态和多维度视角审视金融排斥的观点,虽然全面,但却可能存在同义反复。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金融排斥难题的存在?从既有研究看,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被看作两个最主要的宏观因素。例如,Amaeshi等(2007)认为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金融排斥的诱因不同,但区域宏观经济环境对金融排斥起到了主要作用。循着经济决定金融的主线,微观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即企业运转情况,也被看作影响金融排斥的关键变量(徐少君、金雪军,2009;周立,2010)。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水平息息相关,很多研究发现,居民收入低的地区,金融排斥一般更严重。例如,Kempson和Whyley(1999)认为金融排斥是收入的减函数,即收入低的群体更易受到金融排斥。李涛等(2010)也发现,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高都可以降低居民受到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的反贫困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双W原则”(Who and Where),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入较低,加之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担保抵押不足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等问题,金融机构会倾向于减少向这些地区配置金融资源,结果导致农村地区金融排斥普遍存在。除了宏观因素,分析金融服务需求者的个体特征,如居民受教育程度、语言、宗教信仰和人口结构等,是研究金融排斥问题的另一主要思路(Kempson and Whyley,1999)。综上所述,鉴于数据可得性,对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分为宏观因素主导论和微观属性主导论两种观点,不论哪种观点,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排斥具有“最大的被排斥主体是农民,最大的被排斥地区是农村”的特征,即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金融排斥是农村金融排斥问题。

既有的研究还达成一个共识,即分析金融排斥问题时需要树立地区差异的思维。这点对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排斥问题尤为重要。因为我国2000多个建制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可以说“一县一特色”,金融排斥问题并不存在“一刀切”的解释模式。例如,Mayo(1997)发现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显著。而英格兰东南发展机构(FSA)利用一系列数据,计算出了英格兰各地的金融排斥指数,发现北部与西北部、大伦敦和威尔士金融排斥较严重。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证实,农村金融排斥在中国存在“东低西高”的特征(田霖,2011)。

总体看,关于金融排斥问题特别是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的研究,定性分析者多而实证分析者少,聚焦典型地区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文献更少,具体测度出哪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农村金融排斥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拟在规避上述研究不足方面,尝试做出探索。

三、理论分析

在特定约束条件下,金融机构布局设点的主要依据是利润最大化。一般而言,地区经济越发达,人口密度越大,相应的基础设施就会越好,行政壁垒也会越低,信用环境则会越健全,金融机构的运转成本和风险会越低,利润最大化目标则越容易实现。这可以从 Circle Hotelling 模型中得到证实(谭政勋、王聪,2010),该模型是研究市场化条件下厂商(金融机构)如何设置营业网点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假设:(1)企业和居民等金融服务需求者均匀地分布在密度为 D 的单位圆上;(2)储户把收入存入金融机构的机会成本为 s ;(3)储户到金融机构的距离为 x ;(4)每单位路程的交通费以及办理储蓄业务的成本为 b ;(5)存款利率为 r ,如果 $r - bx \geq s$,则储户愿意把收入存入金融机构;(6)金融机构将存款用于投资的收益率为 L ;(7)开设分支机构的固定成本和营业费用为 F 。

如果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n 家金融机构均匀分布在单位圆上,相邻两家金融机构提供的存款利率为 r_1, r_2 ,储户到两家金融机构的距离分别为 $x^c, \frac{1}{n} - x^c$,则储户从两家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分别为:

$$r_1 - bx^c, r_2 - b\left(\frac{1}{n} - x^c\right) \quad (1)$$

那么,金融机构所获得的利润为:

$$\pi_i = 2 \int_0^{x^c} D(L - r_i) dx - F \quad (2)$$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frac{d\pi_i}{dr_i} = 0$, 因此求得均衡解:

$$r^c = L - \frac{b}{n}, \quad x^c = \frac{1}{2n} \quad (3)$$

将(3)式代入 $r - bx \geq s$ 得:

$$L > s + \frac{3b}{2n} \quad (4)$$

金融机构只有满足这个条件,即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开设分支机构,假设:

$$r - bx = s \quad (5)$$

将均衡解 $x^c = \frac{1}{2n}$ 代入(5)式,得到:

$$r^c = s + \frac{b}{2n} \quad (6)$$

所以,金融机构在竞争均衡点的利润为:

$$\pi^c = 2 \int_0^{\frac{1}{2n}} D(L - r^c) dx - F = \frac{D}{n} (L - s \frac{b}{2n}) - F \quad (7)$$

从金融机构的利润函数(7)式可以看出,在 L 、 s 和 F 固定的条件下, D 越大, b 越小, 金融机构的利润就越高, 金融机构开设分支机构的概率就越大。由于 D 代表企业和居民等金融服务需求者的分布密度, 一般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企业和居民的分布密度就越大。所以一个地区企业和工商个体户等微观主体越多、人口规模越大、交通越便利、市场化程度越高, 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 就越能为追逐利润的金融机构下乡提供对接基础。反之, 则相反。

四、数据选取与模型说明

(一) 数据选取

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不能泛泛而谈, 加之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难题被认为是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中国农村金融学会, 2008), 因此, 本文研究聚焦于欠发达县域相对较多的中部六省^①, 并以 2010 年为例。实证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中部六省是农业、资源大省, 第一产值占比高, 农业和农村人口比重大, 但金融服务水平较低, 且服务覆盖不均匀。中部地区第一产值和人口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29.2% 和 27.5%, 但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却只占 24%(见表 1), 可见, 中部地区人均拥有的金融机构服务网点数与第一产业平均配比的网点数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金融机构网点数的均值为 62, 标准差为 38,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375(可根据表 2 计算得到), 可见中部地区不仅金融排斥严重, 而且县域间金融机构的分布极不均衡。概言之, 设法破解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排斥难题迫在眉睫。

表 1 2010 年中部地区经济金融概况

各类指标	土地面积 (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 (万)	乡村人口 (万)	第一产业总产值 (万元)	金融机构网点数 (家)
全国	960	134 539	82 081	38 415.9	193 688
中部六省	98	36 979	24 367	11 212.8	46 530
占比	10.2%	27.49%	29.69%	29.19%	24.02%

(二) 模型说明

判定某一地理区域是否存在金融排斥,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考察是否存在金融机构(Rossiter, 1997)。一般说来, 金融机构密布的地区, 金融生态环境相对良好, 居民可以比较方便地获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该区域的金融排斥程度相对较低, 反之亦然。考虑到构建金融排斥指数存在较多限制的情况, 银行营业网点数量是金融排斥的直观体现(董晓林、徐虹, 2012)。因此, 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Y_1)来间接衡量金融排斥。另外, 考虑到金融机构间的不同比较优势和市场定位, 厘清“商业类”金融机构和“农村类”金融机构在布置营业网点时的不同偏好, 使得分析结论更稳健, 本文进一步将县域金融机构分为“商业类”^②(Y_2)和“农村类”(Y_3)^③两大类型进行分析。

①中部六省包括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

②“商业类”机构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

③“农村类”机构包括各级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借鉴已有成果,结合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将影响金融排斥的因素分为:

1.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县域生产总值(*GDP*)、县域企业总数(*Company*)、县域个体工商户总数(*Individual*)和第一产业总产值(*Primary*)。县域生产总值(*GDP*)是总量指标,其他指标是结构指标,反映县域微观主体活跃水平,以及产业结构水平。一般而言,县域经济发达、微观主体活跃,更利于吸引金融机构下乡,而产业结构层次偏低,意味着风险更大,对金融机构下乡产生负激励。

2. 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本文将人口规模表征为乡村人口(*Pop_rural*)、城镇人口(*Pop_urban*)和人口密度(*Density*)三个维度。人均收入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Income_rural*)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_urban*)两个方面。不难预测,人口规模和密度大的地区或者人均收入高的地区,更有利于金融服务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因此对金融机构布局设点有正向激励。

3. 金融市场结构。本文选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垄断-竞争”程度。如果该指数大于 0.18,说明垄断相对集中。中部六省所有县域的 *HHI* 值,最小为 0.240,最大为 1,均值为 0.420(可根据表 2 计算得到),均大于 0.18,可以断言市场结构缺乏竞争。竞争不充分的地区金融排斥自然更高。

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具有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特征,即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而本文还引入了政府管制(*Govan*)变量。政府管制即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和干预,用县域财政支出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来间接衡量。金融排斥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失灵,政府合理介入有利于信用环境改善以及抵押担保难题破解,故而能减轻金融排斥程度,但如果行政干预过度,反而不利于金融机构的发展(陈雨露、马勇,2010)。因此,对政府管制的影响效应预测不确定。另外,由于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数据除了包含县和县级市,还包括含有农村人口的地级市行政区,因此本文引入了体现区域差异的地区虚拟变量(D_j)。其中,县市取值为 1,地级市行政区取值为 0。

表 2 指标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样本
$\ln(Y_1)$	4.0604	4.0188	0.5676	2.0794	5.9269	-0.3747	0.4882	667
$\ln(Y_2)$	2.5649	2.6210	1.0065	0	5.7038	0.0872	3.0037	67
$\ln(Y_3)$	3.6636	3.5991	0.5757	0	5.0106	-1.3362	7.2017	667
$\ln(GDP)$	13.6341	13.5724	0.7842	12.0273	14.9294	-0.1901	2.2999	667
$\ln(Company)$	7.1499	7.1060	1.1610	4.2767	9.7649	-0.1281	3.1030	667
$\ln(Individual)$	9.0977	8.9801	0.9644	5.8972	10.7875	-0.8101	4.2615	667
$\ln(Primary)$	11.6054	11.3670	1.1886	8.8537	12.9359	-0.5885	2.3174	667
$\ln(Pop_{rural})$	12.5677	12.2768	1.2448	8.9843	13.7953	-1.0676	3.5631	667
$\ln(Pop_{urban})$	11.6308	11.6069	0.8164	10.0433	13.0121	-0.1387	2.1877	667
$\ln(Density)$	6.0460	6.0770	1.0433	4.3534	8.3342	0.3937	2.6246	667
$\ln(Income_{rural})$	8.6721	8.5824	0.3839	7.7673	9.1977	-0.5516	2.5001	667
$\ln(Income_{urban})$	9.5308	9.5145	0.2515	8.9513	9.9754	-0.2556	2.8422	667
$\ln(HHI)$	-0.9366	-0.8935	0.2174	-1.4278	0	1.0011	4.5316	667
$\ln(Govan)$	-1.9523	-2.0282	0.6720	-3.3238	-0.8389	-0.2105	2.3302	667

综上所述,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ln(Y_i) = \beta_0 + \beta_1 \ln(GDP) + \beta_2 \ln(Company) + \beta_3 \ln(Individual) + \beta_4 \ln(primary) +$$

$$\beta_5 \ln(Pop_rural) + \beta_6 \ln(Pop_urban) + \beta_7 \ln(Density) + \beta_8 \ln(income_rural) + \beta_9 \ln(Income_urban) + \beta_{10} \ln(HHI) + \beta_{11} \ln(Govan) + \beta_{12} D_j + \varepsilon_i \quad (8)$$

其中, ε_i 服从均值为 0 的正态分布, 方差未知。数据经过 winsor 处理后, 取对数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结果表明, 11 个变量均符合正态分布。

五、各因素对农村金融排斥的影响分析

(一)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 Stata11.2 统计软件的 *vif* 和 *hettest* 命令检验表明, 三个模型 (Y_1 、 Y_2 、 Y_3) 有异方差问题, 但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自变量的 *vif* 都小于 10), 因此用 *robust* 命令对异方差进行修正。许多文献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二者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但由于本文并未直接选取一般文献中的金融发展指标, 而是选择金融机构网点数作为替代, 并且对总体模型进行拉姆齐 *t* 检验 (Ramsey RESET test), 检验结果显示不拒绝原假设, 因此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可以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各县金融机构网点数影响因素的 OLS 回归结果

变量名	模型 1 Y_1	模型 2 Y_2	模型 3 Y_3
$\ln(GDP)$	0.313 *** (7.46)	0.418 *** (7.50)	0.234 *** (5.66)
$\ln(Company)$	0.0431 *** (3.27)	0.0590 *** (2.85)	0.0295 ** (2.08)
$\ln(Individual)$	0.0841 *** (4.40)	0.125 *** (4.26)	0.0754 *** (4.16)
$\ln(Primary)$	-0.0564 ** (-2.29)	-0.0744 ** (-2.42)	-0.0180 (-0.64)
$\ln(Pop_rural)$	0.0837 *** (3.31)	0.0301 (0.92)	0.159 *** (5.66)
$\ln(Pop_urban)$	0.269 *** (9.52)	0.390 *** (8.83)	0.222 *** (6.97)
$\ln(Density)$	-0.0228 (-0.90)	0.0697 ** (1.99)	-0.123 *** (-4.63)
$\ln(Income_rural)$	-0.0853 * (-1.86)	0.117 * (1.73)	-0.115 ** (-2.17)
$\ln(Income_urban)$	0.114 * (1.81)	0.0901 (0.97)	0.148 ** (2.48)
$\ln(HHI)$	-0.270 *** (-3.09)	0.330 *** (2.91)	-0.502 *** (-4.77)
$\ln(Govan)$	0.0921 *** (3.12)	0.0898 ** (2.12)	0.0717 ** (2.19)
<i>Dummy_var</i>	-0.0729 (-1.34)	-0.556 *** (-6.87)	0.180 *** (3.35)
<i>Constant</i>	-5.015 *** (-7.88)	-10.07 *** (-10.8)	-4.884 *** (-7.87)
<i>R-squared</i>	0.64	0.75	0.61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性修正后的统计值。

先看模型 1。总体来说, 县域生产总值、县域企业总数、县域个体工商户、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和政府管制均显著正向影响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其次, 金融市场结构和第一产业总产值显著负向影响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上述两点均与前文理论分析高度一致, 不再赘言。最

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金融机构网点数显著负相关,与预期不符,这可能说明,我国目前县域网点配置效率有待改进(主要是农村类金融机构)。

再看模型2。不合乎逻辑的是,金融市场结构对“商业类”机构网点数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金融市场越垄断,“商业类”机构网点数越多,金融排斥越小。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从技术上讲,由于本文衡量的县域“商业类”机构网点数中大型商业银行占主导,而金融市场结构是用各类银行存款份额计算的,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份额占比很高,所以导致金融市场结构与“商业类”机构网点数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从金融机构间博弈上讲,现有金融机构为维护其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可能会通过增加营业网点数,扩大服务宽度来遏制其他金融机构进入,从而导致金融市场越垄断,“商业类”机构网点数越多;从现实情况讲,我国金融机构的行政性进入壁垒高,对非国有银行在市场参与权、参与地域范围、参与程度等方面都施加了政策壁垒,这些行政性进入壁垒维系了大型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陈伟光,2007),导致在地方行政色彩浓厚、金融市场欠发达的中部县域地区,金融市场结构越垄断,“商业类”机构网点数越多,这从侧面说明,降低农村金融进入门槛,加大市场竞争程度,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既必要,也重要。

然后看模型3。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农村类”机构网点数,与模型2实证分析结果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商业银行在网点设置上更市场化和商业化,而“农村类”机构的主体农信社和农村商业银行,受到地域限制及商业化改革滞后等原因的影响,网点配置效率比其他商业银行低(许圣道、田霖,2008)。另外,人口密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村类”金融机构,是因为人口规模、密度大的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经济发展较好,一般是经济发展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中型城市,这些地区大中型商业银行密集,“农村类”金融机构客户基础弱,营业网点少。

最后,综合模型2和模型3看,县域企业总数、县域个体工商户总数、县域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都显著正向影响机构网点数,与模型1一致,再次印证了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但是,第一产业总产值在模型2和模型3中与机构网点数负相关。这主要是因为,现今我国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尚低,“商业类”机构基于自身比较优势的考量,更倾向于服务工业企业等规模客户,而“农村类”机构由于扎根县域,更多地发挥了服务三农主力军作用。这也从侧面启发我们,要引领“商业类”金融机构下乡,并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集约化水平。另外,地区虚拟变量对模型2和模型3的影响也相反,这符合正常逻辑和现实情况,即相对地级市行政区而言,县市的商业银行显著减少。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三个模型中,政府管制均对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问题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政府财政实力雄厚,可为银政合作深化农村金融服务提供更大平台。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建立在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之下,实际情况是,一些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地方政府在GDP冲动和政绩观的引导下,常强行要求金融机构与高风险客户联姻。

(二) 稳健性检验——分位数回归

分位数回归通过分位的选择可对变量分布的头尾部分进行研究,在有效性等方面优于一般的线性回归,并能提供变量之间更加丰富完整的信息(Coad and Hölzl, 2009)。本文选取4个代表性的分位点(0.1、0.25、0.5、0.75),研究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多(高分位点)或者少(低分位点)的县域各个变量的影响程度。借助Stata11.2统计软件的qreg命令,运行得到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4、表5、表6。

表 4 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名	模型 1(Y_1)	模型 1(Y_1)	模型 1(Y_1)	模型 1(Y_1)
	$q = 0.1$	$q = 0.25$	$q = 0.5$	$q = 0.75$
$\ln(GDP)$	0.277 *** (5.09)	0.273 *** (7.23)	0.279 *** (9.02)	0.274 *** (7.28)
$\ln(Company)$	0.0410 ** (2.24)	0.0320 ** (2.07)	0.0313 ** (2.28)	0.0336 ** (1.99)
$\ln(Individual)$	0.0847 *** (3.40)	0.0824 *** (4.71)	0.0893 *** (5.37)	0.0673 *** (2.95)
$\ln(Primary)$	-0.141 *** (-4.84)	-0.110 *** (-5.08)	-0.0920 *** (-5.00)	-0.0185 (-0.82)
$\ln(Pop_rural)$	0.273 *** (15.2)	0.182 *** (11.8)	0.116 *** (7.51)	0.0180 (0.79)
$\ln(Pop_urban)$	0.293 *** (8.50)	0.251 *** (8.79)	0.265 *** (11.0)	0.243 *** (8.14)
$\ln(Density)$	-0.0814 *** (-2.68)	0.0184 (0.79)	0.0111 (0.56)	0.0436 * (1.90)
$\ln(HHI)$	-0.282 ** (-2.49)	-0.308 *** (-3.87)	-0.236 *** (-3.69)	-0.196 *** (-2.61)
$\ln(Govan)$	0.0581 (1.34)	0.0767 ** (2.39)	0.0824 *** (2.85)	0.0620 * (1.81)
Constant	-5.988 *** (-11.1)	-4.960 *** (-13.3)	-4.341 *** (-14.6)	-3.474 *** (-9.92)
Observations	671	671	671	671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性修正后的统计值。

表 5 县域“商业类”机构网点数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名	模型 2(Y_2)	模型 2(Y_2)	模型 2(Y_2)	模型 2(Y_2)
	$q = 0.1$	$q = 0.25$	$q = 0.5$	$q = 0.75$
$\ln(GDP)$	0.404 *** (4.51)	0.423 *** (5.78)	0.369 *** (7.04)	0.407 *** (5.86)
$\ln(Company)$	0.133 *** (2.97)	0.0681 ** (2.23)	0.0533 ** (2.31)	0.0149 (0.46)
$\ln(Individual)$	0.177 *** (3.69)	0.166 *** (4.72)	0.104 *** (3.63)	0.102 ** (2.46)
$\ln(Primary)$	-0.235 *** (-3.40)	-0.154 *** (-3.54)	-0.0960 *** (-3.07)	-0.0671 * (-1.76)
$\ln(Pop_rural)$	0.145 *** (3.17)	0.0417 (1.20)	-0.0404 (-1.54)	-0.0861 ** (-2.27)
$\ln(Pop_urban)$	0.496 *** (5.74)	0.399 *** (6.76)	0.454 *** (11.1)	0.411 *** (7.42)
$\ln(Density)$	0.105 (1.57)	0.196 *** (4.32)	0.201 *** (6.04)	0.216 *** (5.19)
$\ln(HHI)$	0.699 *** (3.61)	0.621 *** (4.07)	0.431 *** (3.92)	0.528 *** (3.61)
$\ln(Govan)$	0.0519 (0.79)	0.0646 (1.08)	0.0213 (0.44)	0.00261 (0.043)
Constant	-10.83 *** (-10.7)	-9.299 *** (-13.5)	-8.138 *** (-16.2)	-7.390 *** (-11.6)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性修正后的统计值。

从总体来看,县域生产总值、县域企业数、县域个体工商户总数、城镇人口、金融市场结构等因素,在各分位点上均显著影响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与上文 OLS 回归结果得出的结论基

本一致。第一产业总产值和乡村人口指标的系数(或绝对值)随着分位点上升而下降,且二者在 0.75 分位点上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金融机构网点数越多的县域,第一产业总产值和乡村人口对金融排斥的影响越小。政府管制在 0.1 分位点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金融机构网点数少甚至出现空白的县域,政府的介入也无法有效缓解其金融排斥状况。这预示着,设法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消除零金融服务区域,是十分必要的。

表 5 显示,县域总产值、县域个体工商户、城镇人口和金融市场结构等因素在各分位点上都显著正向影响“商业类”机构网点数,与上文 OLS 回归结果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县域企业总数的系数随着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且在 0.75 分位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商业类”机构越多的县域,越注重企业的质量而非企业数量。第一产业总产值在各分位点上都显著负向影响“商业类”机构网点数,且系数随着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表明在“商业类”机构越多的县域,服务越趋面向第二产业等规模客户,第一产业的影响越小。人口密度的系数随着分位点的上升而上升,表明“商业类”机构越来越重视人口密集区域的布局设点工作。

表 6 县域“农村类”机构网点数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名	模型 3(Y_3)	模型 3(Y_3)	模型 3(Y_3)	模型 3(Y_3)
	$q = 0.1$	$q = 0.25$	$q = 0.5$	$q = 0.75$
$\ln(GDP)$	0.181 *** (3.13)	0.185 *** (4.99)	0.247 *** (11.4)	0.244 *** (6.36)
$\ln(Company)$	0.00759 (0.33)	0.0321 ** (2.09)	0.0263 *** (2.77)	0.0227 (1.36)
$\ln(Individual)$	0.0321 (1.20)	0.0615 *** (3.43)	0.0639 *** (5.45)	0.0588 *** (2.62)
$\ln(Primary)$	-0.0985 *** (-3.00)	-0.0780 *** (-3.73)	-0.0112 (-0.88)	0.0128 (0.54)
$\ln(Pop_rural)$	0.414 *** (18.7)	0.355 *** (24.3)	0.214 *** (19.7)	0.133 *** (5.53)
$\ln(Pop_urban)$	0.239 *** (5.43)	0.159 *** (6.18)	0.141 *** (8.34)	0.138 *** (4.20)
$\ln(Density)$	-0.162 *** (-4.54)	-0.127 *** (-5.85)	-0.103 *** (-7.44)	-0.0656 *** (-2.72)
$\ln(HHI)$	-0.679 *** (-5.24)	-0.529 *** (-7.01)	-0.461 *** (-10.3)	-0.336 *** (-4.36)
$\ln(Govan)$	0.0354 (0.72)	0.0485 (1.46)	0.0991 *** (4.92)	0.116 *** (3.31)
Constant	-5.877 *** (-10.4)	-4.789 *** (-13.3)	-4.206 *** (-20.2)	-3.218 *** (-9.29)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性修正后的统计值。

表 6 显示,对“农村类”金融机构而言,县域总产值、乡村人口、城镇人口、人口密度和金融市场结构等要素,在各分位点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口密度和金融市场结构影响为负,其他因素影响为正,与上文 OLS 回归结果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县域企业总数、第一产业总产值和政府管制的影响,分别在 0.1、0.75;0.5、0.75;0.1、0.25 分位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县域个体工商户则在 0.1 分位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农村类”机构网点的多少,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和复杂,难用标准模型简单给出标准化解释,这与前文 OLS 分析得出的部分结论具有一致性,也印证了农村金融的复杂性。同时说明,政府设法引导“农村类”机构在市场化方向下改进金融服务,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上述分析虽然有利于我们从总体和结构的角度,窥视各影响因素与金融排斥的纷繁复杂关系。但受制于分析方法,无论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因素,我们均无法得知它们究竟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农村金融排斥问题,这需要诉诸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详见下文。

六、各因素差距在多大程度上解释金融排斥差距

回归方程分解分析方法的先驱是分解收入均值的组间差异方法,但该方法未量化各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贡献度。随后有学者提出了基于回归方程识别和量化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度,但该方法要求过于严格。之后 Wan (2004) 进行了改进,使该方法可以采用灵活的函数形式,并且能够对常数项和残差项的贡献度进行测度,但该方法需要借助专用的计量软件,这限制了该方法的广泛运用。鉴于本文模型采用双对数形式,因此借用 X. B. Zhang 和 K. H. Zhang (2003) 的分析方法。

回归方程分解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如果 $Y = \alpha + \sum \beta_i X_i + \varepsilon$, 那么可以得到:

$$\sigma^2(Y) = \sum \beta_i \text{cov}(Y, X_i) + \sigma^2(\varepsilon)$$
 (9)

其中, $\sigma^2(Y)$ 表示因变量 Y 的方差, β_i 表示多元回归方程中各自变量的系数, $\text{cov}(Y, X_i)$ 表示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X 的协方差。因此,针对金融排斥差距贡献度的分解分析,根据(9)式对回归方程进行分解,可得:

$$\sigma^2(\log(Y)) = \begin{cases} \sum_{i=1}^n \beta_{1i} \text{cov}(\log(Y_1), \log(X_i)) + \sigma_1^2(\varepsilon) \\ \sum_{i=1}^n \beta_{2i} \text{cov}(\log(Y_2), \log(X_i)) + \sigma_2^2(\varepsilon) \\ \sum_{i=1}^n \beta_{3i} \text{cov}(\log(Y_3), \log(X_i)) + \sigma_3^2(\varepsilon) \end{cases}$$
 (10)

其中, n 表示自变量个数,分解结果见表 7。

表 7 分机构考察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解释程度 (%)

模型 1 (Y_1)		模型 2 (Y_2)		模型 3 (Y_3)	
影响因素	解释程度	影响因素	解释程度	影响因素	解释程度
GDP	29.5778	Pop_urban	24.0815	Pop_rural	19.9167
Pop_urban	26.2673	GDP	22.4403	GDP	13.4640
Individual	7.6835	Dummy_var	14.1993	Pop_urban	10.1338
Company	4.2684	Individual	5.5385	HHI	5.6224
Pop_rural	4.1990	Density	5.0448	Individual	5.3898
Govan	3.7963	Govan	3.2465	Dummy_var	5.1172
Primary	3.2550	Company	3.1699	Primary	2.0449
Density	1.8297	Income_rural	2.2004	Company	1.7756
Income_rural	1.7829	HHI	1.9007	Density	1.4231
Income_urban	1.4913	Income_urban	0.9661	Income_urban	0.2392
Dummy_var	0.9623	Pop_rural	0.3655	Income_rural	0.2119
HHI	0.3173	Primary	0.0403	Govan	0.0212
总体解释度	85.43		83.19		65.36

表7的分解结果表明,12个影响因素的差距大约分别解释了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模型1)、“商业类”机构网点数(模型2)和“农村类”机构网点数(模型3)区域差异程度的85%、83%和65%,解释程度较好。总的来说,县域生产总值(GDP)差距约平均解释了三个模型中金融排斥差距的22%,最高的解释了约30%(模型1),最低的也解释了近14%(模型3)。如果按照前文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定义,将县域生产总值(GDP)、县域企业总数(Company)、县域个体工商户总数(Individual)和第一产业生产总值(Primary)加总,则经济因素差异对三大模型测度的金融排斥差异,总解释度平均高达33%,充分体现了“经济决定金融”的基本理念。

城镇人口(Pop_urban)是第二大解释变量。对模型1的解释最高,达到26%,对模型2和模型3的解释分别是24%和10%,平均解释程度为20%。这说明,缩小农村金融排斥差距,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施策思路,关键之一是通过建设新型城镇化来拉动投资增长、释放消费潜能,进而为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创造利好条件。

但是,在三个模型中,部分变量的解释程度差异较大,需要重点分析。以乡村人口(Pop_rural)为例,其差距分别解释了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农村金融排斥差距的4%、0.4%和20%。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解释差异,主要原因是,“商业类”机构和“农村类”机构的市场定位不同,主要面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农信社等“农村类”机构,受到农村人口规模的影响更大。在当前金融市场化改革尚未全面推广的情况下,乡村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农村类”机构能否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并对盈利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点,还可以从地区虚拟变量(Dummy_var)中看出,它对“商业类”机构差距的解释度高达14%,对“农村类”机构差距的解释度却仅为5%。但总体看,以农村人口占比下降为标志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应该是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的重要出路。

前文的分析表明,居民收入水平高低是决定金融排斥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模型测度表明,综合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_rural和Income_urban)两个变量,对三大模型金融排斥差距的平均解释度只有2.3%。这并非说明收入因素不重要,相反,主要是因为中部六省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较小,且总体水平较低,使得收入变量并不构成金融机构在不同县(区)布局设点时考虑的决定性因素。未来多维度增加居民收入应受到重视。

市场垄断因素(HHI)对农村金融排斥的影响,在模型1和模型2中并不明显,但该因素对模型3的贡献高达近6%。这说明降低农村金融市场进入门槛,对“商业类”机构少的农村地区,显得更为重要。

七、政策建议

1. 要大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并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这是解决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的根本出路。经济与金融是共生共荣而非简单的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未来,地方政府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创建产业园区、推动土地流转和降低投融资成本等多种举措,为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特别是要围绕特色经济打造具有品牌效应的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为商业银行下乡支农建立高质量的对接平台。同时,要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镇建设、产业培育以及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协调发展,通过城镇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加快在农村地区布设网点和网络的步伐。

2. 地方政府应通过市场化手段,积极合理介入农村金融市场,努力形成良好的银政合作关系,这是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的基本保障。应该赋予农村金融机构更多的经营自治权,这被世界银行认为是支持发展农村金融新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银政合作对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的破解又必不可少。为此,地方政府要努力做到:一是,要有所侧重地运用财政、税收、监管和法律等政策对商业类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有效激励和引导;二是,通过政策性银行发挥金融服务“三农”的基础性作用,避免商业金融机构业务政策化。另外,还可由政府牵头,努力健全涉农保险以及抵押担保机制等。

3. 在存量金融机构改革的同时,重点通过降低各种门槛等方式,加大增量机构改革力度,这是消除农村金融排斥问题的关键。金融机构下乡动力不足,除了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以及担保、抵押、保险和信用机制的缺失等原因外,主要是缺乏能有效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短、小、频、急”特征的小微金融机构。客户分层理论决定了大型金融机构在服务规模化客户上更有优势,现有农户和小微企业等客户,更适宜由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服务。为此,要通过民营化、低门槛等政策措施,批量培育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缺陷,并且针对当前部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表现出的脱农倾向(服务对象非农化和高端化、服务区域城镇化),及时出台明确的惩罚措施。

4. 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侧重提高农民非农收入,这是规避农村金融排斥难题的基本动力。农民收入水平低对农村金融排斥具有多种效应,如不利于消费金融的拓展、制约了还款能力等。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复杂的过程,金融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素,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教育投资、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城镇化建设、公平配置公共品等均十分重要。或者说,国家要通过打“经济+金融+社会”的政策组合拳增加农民收入,这将最终有利于提高农民利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能力。研究显示,实现农民收入更快增长的根本出路,在于设法增加农民非农收入,为此,还要重点通过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以及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等多种方式,拓展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只有农民收入实现了更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才会缩小,农村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才可期待。

综上所述,破解农村金融难题需要多策并举。但需要强调的是,打政策组合拳虽意味着有所侧重,但切忌一刀切。因为正如本文分析结论所证实的,对金融机构分布情况不同的县域,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力度往往千差万别,这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因地制宜地采取服务策略。

参考文献:

1. 陈伟光,2007:《银行垄断及其市场势力研究》,《国际经贸探索》第2期。
2. 陈雨露、马勇,2010:《地方政府的介入与农信社信贷资源错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4期。
3. 董晓林、徐虹,2012:《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的视角》,《金融研究》第9期。
4. 李涛、王志芳、王海港、谭松涛,2010:《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5. 谭政勋、王聪,2010:《商业银行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对效率的影响研究》,《学术研究》第5期。
6. 田霖,2011:《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7. 汪小亚,2009:《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8. 徐少君、金雪军,2009:《农户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9. 许圣道、田霖,2008:《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研究》,《金融研究》第7期。
10. 中国农村金融学会,2008:《创新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

11. 周立, 2010:《县域金融与资金归农》,《银行家》第 12 期。
12. Amaeshi, K. M. , A. E. Ezeoha, B. C. Adi, and M. Nwafor. 2007.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Missing Link in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ourse."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49,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Nottingham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13. Coad, A. , and W. Hölzl. 2009. "On the Autocorrelation of Growth Rates."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9(2) :139 – 166.
14. Demirgüç – Kunt, A. , and V. Maksimovic. 1999. "Institutions,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rm Debt Matur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4:295 – 336.
15. Kempson, E. , and C. Whyley. 1999. *Kept out or Opted out?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lusion*. London: The Policy Press.
16. King, R. G. , and R. Levine. 1993.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 :717 – 737.
17. Mayo, E. 1997. "Policy Responses to Financial Exclusion." In *Financial Exclusion: Can Mutuality Fill the Gap?* ed. J. Rossiter, 17 – 20. London: New Policy Institute.
18. Rossiter, J. 1997. *Financial Exclusion: Can Mutuality Fill the Gap?* London: New Policy Institute.
19. Wan, Guanghua. 2004. "Accounting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A Regression – 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2(2) :348 – 363.
20. Zhang, Xiaobo, and K. H. Zhang. 2003. "How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Regional Inequality within a Developing Country ?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9(4) :47 – 67.

The Factors and Extent that have Resulted in the Rural Financial Exclusion Problem: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of 667 Counties from Six Central Provinces of China

Tan Yanzhi, Chen Bin, Tian Longpeng and Huang Xiangyang
(Business Schoo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economic data of 667 counties (districts) of six central provinces in 2010,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factors and the extent that have resulted in the rural financial exclusion problem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at's more, the level of county economic gap explains about 33% of the gap in the rural financial exclusion by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analysis. This conclusion also applies to business clas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ich set up distribution points in the county (district). Urbanization factors have been shown to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racking the problem of rural financial exclus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trolling other variables, if the urbanization levels of each county (district) are equal, then the gap of the rural financial repression will shrink about 20%. It is also the key to crack the problem of rural financial exclusion, to build a more competitiv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and to try to achieve faster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For the policy mix boxing fight in the future, it requires distinguishing the priorities as well as taking the measure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Rural Financial Exclusion; Urbanization;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Decomposition Analysis

JEL Classification: G21

(责任编辑:陈永清)